

学海星光

# 毛泽东礼遇民主人士

夏海

毛泽东高度重视民主人士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强调“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更是尊重和礼遇民主人士，充满着政治智慧和人情温暖。在与民主人士交往中，毛泽东希望互相平等，“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总是把我当领袖我也受不了”；希望讲朋友情谊，真诚相待，“待朋友，做事以做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

民主人士系指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他们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党外人士。民主人士既是党的统战工作对象，又是党的统一战线的重要载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毛泽东与民主人士的交往主要集中于延安时期、重庆谈判期间和新政协筹备期间。不同时期的交往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也就有着不同的特点。延安时期，是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让民主人士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坚定对抗战胜利和中国前途的信心。重庆谈判期间，是为了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宣传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赢得了民主人士及社会各界的拥护和支持。新政协筹备期间，是为了与民主人士共商国是，共同建立新中国。

延安时期，许多关心中国命运和抗战前途的党外民主人士络绎来到延安，毛泽东在繁忙之中抽出许多时间接待他们，答疑解惑，宣传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充分展示了领袖魅力。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938年1月，毛泽东与无党派人士梁漱溟的交往，“在延安谈话最多的是毛泽东先生。前后共谈八次。有两次不重要，一是他设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临走之前，他来送行。其余六次，每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两个钟头。最长者，就是通宵达旦。——这样有两次”。梁漱溟通过访问，聆听了毛泽东关于《论持久战》的主要观点，排除了对抗战前途的担忧，“说中国一定胜利，我听他的谈话，把我心中的烦闷一扫而光”（《我的努力是什么》）。1940年6月，毛泽东与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的交往，“毛泽东主席来余寓所数次，或同午饭，或同晚餐”。陈嘉庚通过访问，看到了毛泽东简朴的生活及其与群众的亲密无间，排除

了对中国前途的悲观情绪，认为“中国有救星，胜利有保证”（《南侨回忆录》）。

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等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也有交往。“今天谈话时间特别长，谈到的事项特别多。各抒所见，但不涉辩论，尽大家自由发表。结果约定由中共方面把意见写出来，明日公共阅看”。黄炎培通过访问，留下了著名的“窑洞对”。有一次毛泽东问黄炎培的感想，黄炎培直言相告，“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的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庄重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延安归来》）。

重庆谈判期间，除参加和指导谈判外，毛泽东还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其中多数是民主人士，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1945年8月30日为例，即到达重庆后的第二天，“由林园返回桂园。上午分别访晤宋庆龄、赫尔利。到住地桂园商谈的有：柳亚子、沈钧儒、陈铭枢、王昆仑、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冷通、傅斯年、王云五等”。下午，前往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特园（又称‘民主之家’）访问民盟主席张澜，民盟中央委员、特园的主人鲜特生在座”。“晚上出席张治中的宴会，于右任、孙科、邹鲁、叶楚傖作陪。宴会后，于右任辞去，吴铁城来，毛泽东同他们交谈”。有的民主人士是多次会晤和交谈，三访张澜就是一段佳话。除8月30日访问外，9月2日中午，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到特园，出席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名义举行的宴会”。毛泽东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来了。今天我们聚会‘民主之家’，今后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9月15日下午，“到特园看望张澜，向张澜介绍和谈情况”。张澜的建议，毛泽东表示赞成，并认为张澜是老成谋国。

新政协筹备期间，中国共产党邀请民主人士北上参与筹备开好新政协会议，共商建立新中国大计。仅从香港乘船北上的民主人士就有20多批次177人，约占新政协会议代表的27%，这是一项庞大的统战工程。为了表达真心和诚意，毛泽东亲自迎接新政协代表。对于宋庆龄的迎接，至诚至

敬，感人肺腑。1949年1月19日，“和周恩来致在上海的宋庆龄：‘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6月19日，再次“致信在上海的宋庆龄：‘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8月28日“下午四时，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到北平车站欢迎宋庆龄自沪抵平。晚上，设宴招待宋庆龄”。

对于程潜的迎接，关怀备至，令人感动。1949年9月4日，“函告周恩来、聂荣臻：‘程潜九月二日抵汉，四日由汉动身来平，请即令铁道部注意沿途保护照料，不可疏忽。问准到平时刻，请周组织一批人去欢迎，并先备好住处’”。9月7日“晚十时，程潜到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等一百余人到车站迎接。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和宴请程潜”。有人不理解为何给程潜如此高规格的礼遇，毛泽东予以解释，既有政治高度，又是重情重义，“程潜是个元老，我们特邀他参加新政协。另外，我们又是老乡，他是我的私交朋友，难道你们的朋友来了，你们还叫别人去接吗？”

毛泽东不仅与民主人士共商国是，而且政治上给予充分信任，请民主人士参与国家管理，“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央人民政府有6位副主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3位是民主人士。政务院4位副总理中，郭沫若、黄炎培2位是民主人士；政务院设有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和人民监察四个委员会，其中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是民主人士。当党内有些干部对民主人士不放心和怕麻烦时，毛泽东严肃指出：“现在党内同志不懂得如何与党外人士合作。这个问题不简单，眼光要看到全国与全国”。

毛泽东不仅政治上关心民主人士，而且经济和生活上也给予关心。1950年4月21日，在同李维汉、徐冰谈统战工作

时，强调要重视民主党派及非中共人士，“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民主党派的经费问题、民主人士的旅费问题”。严厉批评有些部门和地方不关心民主人士的做法，“像学校不收民主党派分子，某地委接到民主党派材料就把它撕掉，对党外人士像踢皮球等等，都是不对的，也是不公平的”。毛泽东更是尊重和关心程潜，20世纪50年代每一次回湖南都要看望程潜，说“颂公老年人，免不了留恋家乡，他在长沙有房子，我们给他在北京也准备了一所房子；他在湖南有个职务，在北京也有职务，可以在长沙住，也可以在北京住，只要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不要搞具体工作，让他过好晚年”。

毛泽东不仅同民主人士有着政治沟通，而且有着诗书和思想文化交流。柳亚子是民国时期旧体诗坛领袖，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与其几度诗词唱和，既有“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阕”的共同喜悦，又有“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耐心劝导。新中国成立之后，许多民主人士寄来自己的作品和著述，毛泽东一般都给予答复，以示尊重。其中读得最细的是章士钊的《柳文指要》，该书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洋洋百余万言。毛泽东阅读了全书，帮助改正错别字，指出书中的引文有不当之处，还关心该书的出版，善意地给予提醒。“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1938年1月，梁漱溟访问延安，毛泽东曾与其讨论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不明显、不强烈、不固定，不同意搞阶级斗争，要走改良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则指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双方的讨论从晚六时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天明。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认同了毛泽东的观点（《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

白居易诗云：“以心感人人心归”。一般而言，民主人士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诗书和思想文化交流，是毛泽东礼遇民主人士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开辟了与民主人士内心交流的通道，更好地把民主人士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计献策和贡献力量。

人物掠影

行走在贵阳的大街小巷，到处飘散着浓浓的栀子花香，总让我想起在贵阳读书与工作的幸福时光，也让我分外地想念龙志毅爷爷。

时间如白驹过隙。龙爷爷离开我们已近两年。每每提起笔，心情是如此沉重又不知从何下笔，深怕无法写出这位我人生中遇到的“智者”。龙爷爷对我的点滴教诲与关照，像一盏灯塔照亮着我，鼓励我前行！

## “我是人民的公务员”

2008年阳春三月，我在即将结束在《贵州都市报》的实习、准备返校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学校教务处的老师找到我，说省里有位老领导看了我的文章，想跟我通个电话。当年年少时的我怀着紧张忐忑的心情打过去，听到从话筒另一端传来一位老爷爷和蔼慈祥的声音。老爷爷开门见山地说，他是龙志毅，老家是云南的。他近日读到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追忆生命》和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贵阳印象》两篇文章，得知我来自云南大理。他夸我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感悟和写作能力，让我好好学习，多写出优秀作品。在电话里他还了解了我的一些个人情况，并欢迎我这个小老乡有空去他家里坐坐。

一个周末，我来到龙爷爷家拜访，受到他和家人的热情接待。交谈时，我得知龙爷爷是云南永善人，尽管离家几十年，但他依然怀有浓厚的家乡情怀，说话依旧带着浓浓的云南乡音。聊天得知龙爷爷出身于彝族世家，在家里排行最小。他的父亲是清末时期的贡生，在他年幼时就去世了。他一直在母亲身边长大，直到去昭通和昆明读书才离开母亲。提起龙家往事，龙爷爷思乡之情溢于言表。龙爷爷还提起他的几位同学，他和普朝柱老人是昆明长城中学的同学，一起参加过学生运动。在当时他们都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青年同盟。新中国成立后，因龙爷爷分配到贵州工作，他们便失去了联系。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普朝柱与时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的龙志毅在一次会议上不期而遇，才恢复交往。在普朝柱老人去世后，龙爷爷满怀深情地写了《忆朝柱》一文，以此表达对老同学的怀念。龙爷爷后来考入云南大学法律系就读，尚未毕业就被分配到贵州团省委工作。他的云南大学毕业证书，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落实政策”时才得以补发。龙爷爷在1993年至1998年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每当提到这一职务时，他总是幽默而风趣地说，龙云是旧时代的“龙主席”，而我这个政协主席，就是人民的公务员。

## “认识脚下的土地，要敢于发问、善于提问题、勇于去问”

毕业前夕，我不想回大理，想在外面的精彩世界闯荡一番。这时刚好中共贵州省委主办的党刊《当代贵州》杂志社要招聘几名编辑和记者，我凭着在各报社、电视台的实习经验和成果，顺利地进入杂志社工作。

因为杂志社工作的需要，我对龙爷爷有了更多了解。龙爷爷在任贵州省政协主席前，曾任贵州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副秘书长等职。龙爷爷是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代表，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同时，他还是一位多产的作家。

当时《当代贵州》杂志社在贵州省委10号院办公，龙爷爷的家就住在省委办公区的南明河左畔，与我的办公室仅有一墙之隔。我不时会去龙爷爷家拜访，期望得到这位德高望重、知识渊博、阅历丰富的长者的指点引导。在我与他的近距离相处中，能感觉到他的淡泊、从容，感觉到他自我修养的力量，这些优良品质不仅影响着他的子女们，还影响着与他一起工作、一起相处的人。

每次和龙爷爷见面，他都让我谈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给予我一些生活、工作上的建议。有时读了他的书后去看他，他也总是先静听我讲阅读感悟，然后和我作一些讨论。龙爷爷教导我说，做一名记者、编辑，首先要有政治敏锐性，要有政治鉴别力，还要有认识脚下的土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能力；要掌握了解贵州省情、县情，熟悉人文历史；知识面要宽，不能局限在自己的条条框框里；要学会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要能够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去分析看待问题。龙爷爷还教导我说，当记者不能只会写，还要有胆有识，敢于去思考、面对和提出尖锐的问题。

正是龙爷爷的这些教诲，不仅让孤身在异乡学习和工作的我有了精神的力量，还激励着我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之余去图书馆、书店寻书阅读，了解贵州的人文历史、社会经济发展、风土民情等，提高自己认识社会的知识维度。

## “要脚踏实地，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

2010年9月，因父母的期盼，我决定离开贵阳，回家乡大理工作，临行前我去向龙爷爷辞别。这突然的告辞，多少让龙爷爷有点惊讶，他沉思一会后问我是否考虑成熟了，回到大理是否就会有工作？我说找了一家媒体，一回去就可以上班。他听后语气缓和地对我说，一个女孩子在外打拼也不容易，回到父母身边也好。我到这报社了，也算实习无数，有一些人这山望着那山高，终究一事无成。我把这句话当成龙爷爷对我的临别赠言。我想，一个人只要认定目标和方向，就要脚踏实地、努力用心做好，坚持就一定能见成效。

回家乡工作不久，我利用去贵阳出差的机会到龙爷爷家里去看望他。龙爷爷很高兴，他问了我工作、生活情况，问得很仔细，并给了我很多鼓励。临别时，龙爷爷依旧如往常一样，热情地把我送到家门口。

2011年，我考上了基层乡镇工作的岗位。上班之后，我趁回贵阳提取个人档案的机会，又去龙爷爷家看望他。他开玩笑地说，这个世上多了一名公务员，少了一名记者、作家。他依然鼓励我要好好工作，珍惜年华，保持爱读书的好习惯。他还说当公务员，特别是在乡镇工作，要耐得住艰苦，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他要我多体验生活，多写日记、多思考，要学会用老百姓的语言说话，不要说那些官话、套话。龙爷爷的话，始终深深印刻在我的心中。

在基层工作的几年时间里，我一直都通过书信向龙爷爷汇报我的工作情况，铭记他的教诲，坚持读书、坚持独立思考和调查研究。2014年，我从基层选调到大理州政协工作后，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龙爷爷，并向他汇报了我的近况。他以政协“同行人的口吻告诉我，政协是个联系广泛的组织，是个大舞台，只要努力工作，是大有可为的。

只是没想到，我与龙爷爷在2011年的那次相见，竟是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2022年元旦，我突然读到叶小文委员写的《说不尽的龙志毅》，才获悉我心中无比敬仰和爱戴的龙志毅爷爷与世长辞！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水如决堤的洪水般往外涌……冷静之后，我立即和龙爷爷生前的工作人员联系，想要赶去贵阳参加追悼会，送老人家一程。但当时肆虐的疫情，终究阻断了我向龙爷爷的最后告别，这是留给我一生的遗憾。

龙爷爷去世的这一年多，我陆续看到一些追忆龙爷爷的文章。从这些文章中，进一步了解到龙爷爷为人、为文、为政的经历和成就，了解到他作为贵州的人才培养、改革开放所作出的贡献。这不禁使我想起与龙爷爷相识的那些年月，他从未向我提及过有什么样的“丰功伟绩”。只记得有一次我去看他时，正巧碰到他的一位老同事来他家里闲坐，谈及过往的人与事，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弹指一挥间，都付笑谈中。

而今，重游贵州街巷，又让我不禁想起龙爷爷、他的教诲、他的鼓励、他的引导，仿佛还在耳边，让我面对生活不敷衍、不害怕，让我心地干净、自带锋芒的豁达生活，更敢地成为自己。我想，这也是龙爷爷希望我能活成的样子。

# 追忆「智者」

赵瑾芝

大家小说

# 初见

## ——写于迦陵先生百岁华诞

祝晓凤

最早读到迦陵先生（叶嘉莹先生）的文章，是在1986年的《光明日报》。那年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我小时候，家严多年自费订《光明日报》。他在大学教书，为了备课、写论文，经常做剪报。我就学着，看见自己喜欢文章，也剪下来粘帖，再装订成册。当年还真剪了不少《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的文章，其中有程干帆的文章，有陈子谦论钱锺书的等，总之是文史方面的为多。叶先生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系列专栏文章，就是“迦陵随笔”。第一篇“前言”写于1986年10月3日，第二篇《似是而非之说》写于10月6日，第三篇《从现象学到境界说》写于11月2日，第4、第5篇也都写于11月。前5篇都发表于1986年，都是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

可以说整个20世纪80年代，我们还处在一个逐步开化、与整个世界重新接通声气的时代，人们不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比较闭塞、贫乏、僵硬。此前我读文学评论，是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写出像《四部古典小说评论》那样有气势的文章。可是读《迦陵随笔》，虽似懂非懂，但完全是另一个感觉，而且这感觉还是很新鲜强烈的。首先，谈的是词学，是纯文学，也是我完全不懂的新内容。其次，运用的方法概念也是新的，文章虽短，但涉及文学、宗教各方面，不仅有儒、释、还有道教；谈《人间词话》，却引用佛语，还有现象学、接受美学的理论。真的是让人眼界大开。我就是读“迦陵随笔”才知道现象学、符号学这些新词的。第三，文章的语言也新鲜，是那种典雅、平和的语言，和从容、温和的语气。

1990年秋，我大学4年级，开始给《南开周报》投稿。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报纸的天下。《南开周报》是南开大学校报，四个版，学校的重要信息、通知，上面都有。还有专版和副刊，内容丰富，非常正规，在南开园内地位很高，被我们称为“南开的《人民日报》”。虽说在校内发行，但发行量惊人，每期高达5000余份儿，全校每位教师、每个学生宿舍都有一份儿。而且当年全国各大高校之间，校报互相交流赠送，所以，《南

开周报》的实际影响是超出南开园的。1991年10月间，一次大家聊起来，想在报纸上搞点儿创新，就都说《光明日报》“学者问答录”办得好，有特色，我们也办一个“学者访谈录”栏目，让我来写。二版编辑杨光伟老师曾做过杨石老校长的秘书，他说这个栏目就放在他的版上。正好这时系里通知，说叶先生有个讲座。大家商量，就让我去采访叶先生，作为这个栏目的开篇。当时系里指派余才林给叶先生做学术助手。老余长我几岁，是同级研究生同学，跟郝世峰先生读唐代文学。记得在叶先生讲座前，请老余提前给叶先生打了招呼。叶先生的那次讲座，其实是在中文系的一个小型讲座，在主楼116小教室，人并不太多。叶先生讲完，老余领我上前相见。叶先生站在讲台后面，因为刚讲完课，显得有点儿累，也比较严肃，话也不多，说完完稿，要给她看一下。说话间，我就说起自己上中学时就在《光明日报》上读到她的《迦陵随笔》。叶先生知道我存有《迦陵随笔》完整一套剪报，就说，她最近讲课，要用到这组文章，需要查用其中一篇，但是她手头儿没有，问我可否借给她一用。我说这当然没有问题。

报道写成后，拿给叶先生过目，她阅后没有大改动，只改了一些字句。这次见面当然又简单聊了一会儿，她问了我读什么专业，读过哪些书。报道发在《南开周报》1991年12月14日二版头条，题为《学费中西 艺达古今——访叶嘉莹教授》。文中主要讲了两点，叶先生自幼受地道的传统旧式教育，有旧学根基，对旧诗词有自己独到的深刻领悟，借用西方理论术语不过是为“方便”而已，与六七十年代以后一些为赶时髦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的人完全不同；叶先生认为做学术，要有内在追求，她讲授课程，也不以知识和文字为目的，而是要以诗词中的感发的生命本质来感染学生。文章只有1000多字，自然不可能有多深多全的内容，文从字顺而已。不过杨老师郑重其事，专门请人绘制了一个栏目专用的栏头，放在版面上，比较醒目。报纸出版当天就请余才林给叶先生送去了几份儿。

又过些时日，一天晚饭后，六点来钟，老余敲门进来，说有事找我——我和田新舟住研究生宿舍十七楼515，老余住隔壁516，平时互相串门不分彼此，这次却面带严肃。他说叶先生看了《南开周报》上的报道，比较满意，让我去找她一趟，不知道有个什么事儿。第二天，我就随老余一起，再去专家楼一层最东头儿的那间，见叶先生。

叶先生说，她的《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出版后，四川大学的缪钺先生来信，非常肯定此书，希望有人来写书评，叶先生拿出缪先生的信给我看。信的部分内容，叶先生后来在《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增订版的序言中有引用。叶先生说，她从来没有找人为她自己的书写过什么话的，可这次是缪先生这样主张。她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上次她听我说中学时就读她的文章，而且正好是现在收入《中国词学的现代观》的《迦陵随笔》，她觉得我研究生专业又是文艺学，了解一点儿西方文艺理论，也许可以写这篇文章。

我当时听了，感到有些突然，有些不知所措，就和叶先生说，让我回去考虑一下。回来时，老余、老田和胡学常几位同学都鼓励我，说就当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可我还是没有信心，就凭我小学时背的《宋词一百首》，怎么能担此重任。

两三天后，又去见叶先生，算是勉强应承下来。这样一来，去叶先生那里就多了。为写此文，她专门约我长谈了一次，讲她的思路，我也把自己初步的想法说了。我再回来后，先找相关的书，补课学习，然后起初稿。初稿叶先生不满意，我们又比较正式地谈了一次。后来是胡学常帮着我理思路，我又大改了两次。我现在还记得五月初的一个晚上，在《南开周报》编辑部，有老田陪着，我和老胡一起探讨了两个小时。文章前前后后改了四五遍，6月底、7月间成稿，近一万字。文章好坏另说，于我个人而言，学习提高和练习写作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文章除了论及《中国词学的现代观》，还论及叶先生的另一种新著《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

（《中外文学》第20卷第8期、第9期），主要谈了叶著三个方面的学术创新和学术意义：感性 与知性结合，对词的特质，对“境界”说为代表的王国维词论作了富有创见的理论化阐述；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来把握词学上的研究对象；运用西方理论，进行了成功的批评实践和理论建设，打通诸家隔碍，在中西文论之间架起一座桥。

文章改定誉清后，叶先生寄给四川大学的缪元朗先生，就是缪彦成先生的哲孙。缪元朗把文章推荐到《四川大学学报》，发表在1992年第4期，总第75期，题为《中西融汇的现代词学观——评叶嘉莹先生的两种词学近著》。当年的川大学报还是季刊，这一期是1992年12月下旬出版。这是我平生正式的学术期刊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无论是对于当年一个20多岁的青年，还是对于今天已经过半百的我来说，这篇文章都有特别的意义。说叶先生是我学术研究上的引路人和老师，是不为过的。

1993年夏天，天津的谢景林先生等人张罗，由河北教育出版社为叶先生出一套文集，共十种，其中一种是《我的诗词道路》，这是最早的以叶先生自传经历为题目的书，这套文集也是叶先生出版的第一套文集，当为研究者重视。当时编辑《我的诗词道路》时，叶先生让我帮她复印、选编她的文章。她本人则亲自选了多篇他人的文章作为附录，有谢景林、赵玉林两位先生写的长篇报告文学《明月东天》，两篇缪钺先生的文章，一篇周汝昌先生最初发表在《读书》杂志的《愿抛心力作词人》，最后，就是《四川大学学报》上的这篇。书出版时，已经是1997年7月。叶先生当面签名赠我一本。遗憾的是，此书编校错误较多。

从《光明日报》读先生文章算起，已直接交37年。因《南开周报》拜识先生，开始直接交往，于今已33个年头了。载有叶先生文章的这两份报纸，1992年的《四川大学学报》，还有先生当年亲笔签名、亲手赐我的《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和《我的诗词道路》，一直都在我手边，平展干净如新。

附记：著名中国古典诗词研究专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南开大学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叶嘉莹先生今年迎来百岁华诞。10月15日，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举行。会议由南开大学、中央文史研究院、国际儒学联合会主办。来自国内外近200位学者齐聚一堂，共话中华诗教的传承与弘扬，以学术研讨交流的方式向叶嘉莹先生致敬。百岁高龄的叶嘉莹先生亲临开幕式现场，讲述自己的诗词人生与诗教情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审、《人文》学术集刊主编）